

情緒政治與不對稱戰： 以 2014 年烏克蘭危機為例

吳宗翰

網路作戰與資訊安全研究所

壹、前言

隨著 2014 年克里米亞 (Crimea) 併入俄羅斯聯邦以及烏克蘭東部頓巴斯地區的頓涅茨克 (Donetsk) 與盧甘斯克 (Luhansk) 等州爆發反基輔中央政府的分離主義並分別宣稱獨立，烏克蘭—俄羅斯衝突已成為近年來國際最為關注的區域衝突之一。烏克蘭與俄羅斯在土地國力資源與兵力數量大小不對稱，然而後者在不發動大規模的軍事行動下，透過結合傳統與非傳統手段在兩個月內達到領土擴張、牽制基輔政局與北約的行動，更創造了戰術與戰果上的不對稱戰 (asymmetric warfare)，案例相關過程值得研議。¹有關文獻對此有提及認知戰 (cognitive warfare) 與資訊戰 (information warfare) 在其中的貢獻，²然而對相關機制如何發揮作用的討論則相對缺乏。本文試圖引入心理學中對情緒、感知與認知的分析，以填補相關空白。本研究成果亦可補充以族群因素為解釋框架的途徑，³指出情緒作為一中介機制如何影響不同社會階級、文化、血源的個體採取相同行動。

¹ 俄羅斯人口 142,122,776，現役部隊 1,013,628，後備部隊 2,000,000；烏克蘭人口 43,952,299，現役部隊 255,000 後備部隊 1,000,000。Global Firepower 2020，<https://www.globalfirepower.com/>。

² Robert G. Angevine, John K. Warden, Russell Keller, Clark Frye, *Learning Lessons from the Ukraine Conflict* (Virginia: Institute for Defense Analyses, 2018); Phillip A. Karber, "Lessons Learned from the Russo-Ukrainian War," *The Potomac Foundation*, July 8, 2015; Michael Kofman, Katya Migacheva, Brian Nickiporuk, Andrew Radin, Olesya, Tkachva, Jenny Oberholtzer, *Lessons from Russia's Operations in Crimea and Eastern Ukraine*, RAND Corporation, 2017; 傅文成 (譯)，〈俄羅斯以資訊戰 回應現代戰爭改變 (上)〉，《青年日報》，2017 年 12 月 5 日，<https://www.ydn.com.tw/News/267150>；〈俄羅斯以資訊戰 回應現代戰爭改變 (下)〉，《青年日報》，2017 年 12 月 6 日，<https://www.ydn.com.tw/News/267292>。

³ 謝國斌，〈烏克蘭的族群政治〉，《台灣國際研究季刊》，第 11 卷第 3 期，頁 129-53；Olga A. Onucha and Henry E. Hale, "Capturing Ethnicity: The Case of Ukraine," *Post-Soviet Affairs*, Vol. 34, No. 2-3, April 2018, pp. 84-106.

直言之，本文認為烏克蘭國家近二十年來由於持續推動國家認同工程以及在政經發展道路上長期擺盪於倚靠歐盟或俄羅斯，其國內早已瀰漫高度意識形態對抗。這種對抗雖常為人聯繫至族群或地域分界，但實際上內涵更為複雜。一旦有心者介入，衝突難以避免。爬梳 2013 年底至 2014 年中烏克蘭廣場革命（Euromaidan）以降的國內外政治格局，俄羅斯彼時藉資通訊管道動員烏克蘭東南部地區民眾反基輔情緒奏效，是其短期內對烏克蘭行動取得重大優勢的關鍵。

本文以下分成四個部分。前言說明要旨。接著討論概念框架，著重在情緒、感知與認知的相關性與不對稱戰可著力之處。本文從第三部分進入案例討論，分析廣場革命爆發後克里米亞與烏東地區情勢以

Ukraine, Crimea and Separatists



及俄羅斯在當地的行動。在結論處闡述烏克蘭案例對我國的啟示。

圖 1、克里米亞、頓涅茨克與盧甘斯克位置圖

資料來源：112 Украина，<https://112.international/opinion/waiting-for-a-reality-check-in-crimea-five-years-on-37470.html>。

貳、認知戰涉及的心理機制

認知戰近來因其效用可發揮的不對稱益發受到各國政府重視。近年來多起國際重大事件，包括本文探討的烏克蘭地區衝突、2016年的脫歐（Brexit）公投通過、同年川普當選美國總統等均被指出背後參雜相關因素。這些事件除顯示出後冷戰以來國與國之間的對抗型態已隨著資訊科技推陳而開闢新戰場，有鑑於認知戰手法展現的多元性，更使得其在戰略、作戰與戰術層次均有極高的研討價值。蔡英文總統在其2020年5月20日的就職演說中，「認知戰」亦同「網路戰」與「超限戰」並列，提醒國人注意防範來自中共發動的對台威脅。⁴

認知戰得以奏效立基於一連串複雜的人類心理機制。這個過程並涉及認知、感知（perception）以及情緒（emotion）之間的相互影響關係。在心理學的研究中，認知的位階通常被認為高於感知，它指涉人類運用思維處理資訊內容的內在心理過程，包含形成概念、感知、理解、判斷、想像以及給予事物邏輯化等活動，使行為者可以透過思考而獲取知識並再產生新知識；認知過程可以是有意識或無意識的進行。

另一方面，感知強調人類接收（receive）到外界刺激時對於該事物的理解、立場或態度。它指涉人類對於外在事物的解釋與詮釋。一般認為，行為者所處的環境對其立場的形塑有影響。在政治心理學與國際關係的文獻中，感知已被用來解釋國家或是一行為者對另一行為者的詮釋將影響前者對後者的行為。例如，國家間「安全困境」的形成即被認為參雜感知的因素。在族群衝突的研究中，感知的角色亦被廣為重視。⁵對於感知的討論有助於彌補傳統理性選擇途徑解釋力不足的問題。

⁴ 〈就職演說〉，中華民國總統府，2020年5月20日，<https://www.president.gov.tw/Page/586>。

⁵ Robert Jervis, *Perception and Mispercep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7); Ken Booth, Nicolas J. Wheeler, *The Security Dilemma: Fear, Cooperation and Trust in World Politics* (Palgrave Macmillan, 2007); Shiping Tang, "The Security Dilemma and Ethnic Conflict: Toward A Dynamic and Integrative Theory of Ethnic conflict,"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2011, pp. 511-536. Barry R. Posen, "The Security Dilemma and Ethnic Conflict." *Survival*, 1993, Vol. 35, No. 1, pp. 27-47.

近來，學界開始關注到情緒在衝突爆發過程中的作用。有關於特定情緒如（不）安全感、焦慮、憤怒、恐懼、喜悅等均出現相關的質化與量化研究。這些文獻指出，情緒與感知、認知存在連動關係，並可能在相關條件配合下導致國家間與國家內暴力衝突的發生。它們的觸發機制基本邏輯存在多重路徑，包括情緒首先影響認知，認知再影響感知暨行為；也可能是情緒先影響感知再認知；感知先影響情緒再影響認知：這些路徑也可能彼此形成循環，相互強化。⁶

綜上所言，認知、感知與情緒會相互影響，牽一髮可能因此動全身。隨著人類對認知戰的研究越深，有關其操作（operation）也成為重要探討課題。學研界開始關切，對手會否藉可乘之機，透過影響情緒而改變認知。⁷

「劍橋分析（Cambridge Analytica）事件」的爆發，鮮明地揭示了認知戰如何被運用到影響投票行為上。該公司透過行為精準鎖定技術（microtargeting）與「行為可預測性」的概念，為客戶在選戰中首先透過大數據將選民分類分群，並採取客製化的方式分別壓制（deter）與動員客戶的潛在反對與支持的選民。其中關鍵便是情緒動員，投其所好或所惡，以影響行動，最終為客戶贏得選戰。觀察「劍橋分析」公司經手的案例如脫歐以及 2016 年的美國總統大選，可以看到認知戰的運用呈現出高度靈活性。一方面，行為者可以透過資通訊手段改變受眾（target audience）的思維暨行為，另一方面也可以用同樣邏輯

⁶ Daphna Canetti, "Emotional Distress, Conflict Ideology, and Radicalization," *PS: Political Science & Politics*, 2017, Vol. 50, No. 4, pp. 940-943; Jonathan Leader Maynard, "Ideology and armed conflict,"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2019, pp. 1-15; Jacques Bertrand, "Ethnic Conflicts in Indonesia: National Models, Critical Junctures, and the Timing of Violence," *Journal of East Asian Studies*, 2008, No. 8, No. 3, pp. 425-449; Omar Shahabudin McDoom, "The Psychology of Threat in Intergroup Conflict: Emotions, Rationality, and Opportunity in the Rwandan Genocid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012, Vol. 37, No. 2, pp. 119-155; Wendy Pearlman, "Narratives of Fear in Syria,"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2016, Vol. 14, No. 1, pp. 21-37; Smadar Cohen-Chen, Eran Halper, Roni Rorat, Daniel Bar-Tal, "The Differential Effects of Hope and Fear on Information Processing in Intractable Conflict," *Journal of Social and Political Psychology*, 2014, Vol. 2, No. 1, pp. 11-30.

⁷ Georgii Pocheptsov. Cognitive attacks in Russian Hybrid Warfare. *Information & Security*, 2018, Vol. 41, pp. 37-43.

而相異的手法大幅強化人們採取行動的意願。重要的意涵是，行為者可藉由強化原有存在於社會上的差異與分歧激化人們，直到「激情[···]取代一切」。⁸

誠然，認知戰的應用領域絕不僅止於選舉對手之間的攻防，反之，它早已無聲地被帶入國與國之間的較量。當認知戰搭配發動實體空間的攻擊而成為混合戰（hybrid warfare）時，其能痛擊對手之處的效果未必亞於傳統武力對抗。⁹本文以下以克里米亞併入俄羅斯及烏東地區衝突為例，進一步闡釋之。

參、俄羅斯在克里米亞與烏東地區的操作

2013年11月開始，數十萬計的烏克蘭人聚集在基輔獨立廣場，抗議立場親俄的總統亞努科維奇（Viktor Yanukovich）暫緩原訂與歐盟要簽署的貿易協議；稍早之前有消息指出烏克蘭將參與俄國主導的歐亞經濟聯盟關稅同盟。這場反政府運動持續至2014年2月初直到國會通過總統彈劾案為止，被稱為「廣場革命」。儘管莫斯科當局在這期間始終批評抗議者與西方，但直到了亞努科維奇下台出逃俄國才開始採取軍事行動。

烏克蘭與俄羅斯在歷史與文化淵源上極為密切。當代烏克蘭國家東半部以及克里米亞地區在蘇聯成立之前已有數百年直接或間接為俄羅斯帝國的一部分；烏克蘭語與俄語亦有8成相通性。烏克蘭國家於1991年宣布獨立之後，基於前蘇聯的遺緒，烏克蘭與俄羅斯居民來往無需簽證，可自由進出；兩國在經濟、工業聯繫亦多。此外，儘管烏克蘭法律禁止雙重國籍，但基於工作、婚姻、求學等許多事務的便利性，許多烏克蘭人都另外擁有俄羅斯護照。上述這些背景不僅奠

⁸ Brittany Kaiser 著，楊理然、盧靜譯，《操弄：劍橋分析事件大揭秘》（新北市：野人，2020），頁199-202。

⁹ Bret Perry, "Non-Linear Warfare in Ukraine: The Critical Role of Information Operations and Special Operations," *SMALL WARS*, August 14, 2015, <https://smallwarsjournal.com/jrnl/art/non-linear-warfare-in-ukraine-the-critical-role-of-information-operations-and-special-opera>.

定了當代烏俄紐帶基礎，亦導致烏克蘭民眾存在對「俄羅斯」（國家的、或歷史與文化的）的複雜情感。

事實上，當廣場革命發生之際，烏東地區與克里米亞也有不少民眾參與反政府抗議，卻不必然是出於支持強化烏歐聯繫的脈絡（見下圖2）。根據克里米亞公投前後一些記者在當地對民眾的訪談，民眾表達了對長期以來基輔當局視他們為邊陲的不滿。同時，出於對政治腐敗、貪汙、社會發展不佳的失望，這些因素亦促使當地民眾挺身抗議。¹⁰這些情緒很大一部分被經過放大後，為俄羅斯介入爭取當地民眾支持起到正面效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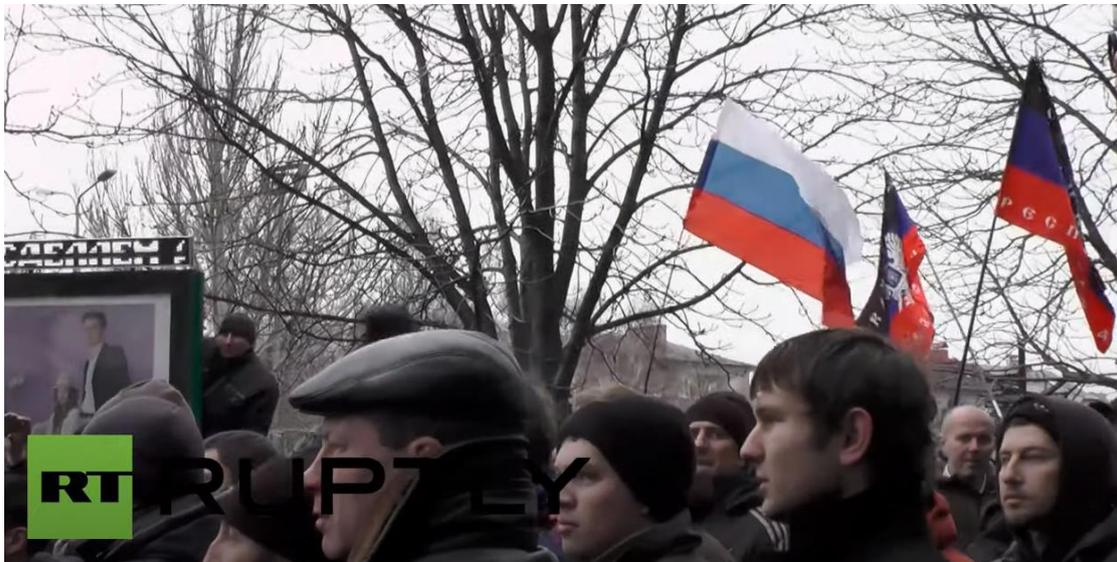


圖 2、頓涅茨克地區的抗議者

資料來源：RT。

從展開軍事行動的一開始，俄羅斯即注意到運用俄語媒體發聲。¹¹由於烏克蘭處於廣義俄語世界圈中，Russian Today（RT）、Sputnik News、NTV、PBK 集團與 All-Russia State Television and Radio

¹⁰ 張曉芳，〈前方記者手記：克里米亞公投非「在俄軍槍口下」〉，《環球網》，2014年3月18日，<https://world.huanqiu.com/article/9CaKrnJEBQy>；〈克里米亞人不滿長期遭漠視 因政府腐敗缺少歸屬感〉，《人民網》，2014年3月19日，<http://gz.people.com.cn/BIG5/n/2014/0319/c344103-20809954-2.html>。

¹¹ Роман Шутов, “Russian Propaganda in Ukrainian Information Space,” *Media Sapiens*, January 22, 2015, <https://ms.detector.media/articles/post/12407/2015-01-22-russian-propaganda-in-ukrainian-information-space/>.

Broadcasting Company (VGTRK) 旗下的節目、VKontakte (VK) 以及眾多俄語傳媒與社群媒體在烏克蘭國內有大量的閱聽受眾與用戶，這為莫斯科提供了影響群眾的優勢。與此同時，俄國也透過網路攻擊或關閉網站等方式限制烏克蘭語媒體運作。而後，隨著在克里米亞的控制力度增強，俄羅斯軍隊在 3 月 9 日起更是在當地關閉所有烏克蘭語電視頻道，僅留下俄語頻道。這種作為無疑更進一步限縮當地民眾的資訊接收來源，為俄國政府傳聲助益。

透過傳媒，俄羅斯在克里米亞以及烏東地區向居民發動多樣的宣傳。這些宣傳內容有的著重在強化與激化情緒，有的則重視認知思維上的改變。不論如何，一旦投放的話語論述引人共鳴，經過情緒—感知—認知的心理機制運作，民眾就容易最終被動員起來。歸結來說，俄羅斯當時一方面強力塑造自身對當地的友誼、同情以及值得信任；另一方面，俄羅斯也呈現出極為進攻的態度，大力抨擊基輔與西方。隨著軍事行動的部署準備，俄羅斯的語調也愈趨強硬。在親俄分子發動佔領克里米亞政府大樓的前一天，俄國更是聲稱基輔的政權更迭不具正當性。

對當時的觀察指出，「歷史」是支撐俄國論述的重要一環。不斷被強調的相關論點包括「克里米亞在歷史上是俄羅斯的一部分」、「烏東與烏南地區在歷史上屬於俄羅斯帝國」、「1954 年蘇聯赫魯雪夫將克里米亞贈與烏克蘭是一歷史錯誤，現在是時候修正錯誤」等。¹² 很明顯地，俄國欲藉此在認知面向塑造出烏俄的緊密性與一體性（見下圖 3）。

¹² Michael Kofman, Katya Migacheva, Brian Nickiporuk, Adrew Radin, Olesya, Tkachva, Jenny Oberholtzer, *Lessons from Russia's Operations in Crimea and Eastern Ukraine*, RAND Corporation, 2017, pp. 14; 50-53; Elina Lange-Ionatamišvili, Jānis Bērziņš, Aivar Jaeski, Mark Laity, Nerijus Maliukevicius, Aurimas Navys, Gerry Osborne, Robert Pszczel and Stephen Tatham, *Analysis of Russia's Information Campaign against Ukraine* (Riga: NATO StratCom Centre of Excellence, 2015).



圖 3、親俄份子支持克里米亞公投的集會

說明：(標語由左至右) 俄羅斯愛克里米亞、克里米亞愛俄國、克里米亞與俄國、我選擇俄國、為了克里米亞的未來，與俄國在一起。

資料來源：克里米亞政府網站，<http://crimea.gov.ru/foto/society/09032014>。

另一方面，俄國亦透過訴諸二次世界大戰「衛國戰爭」的論述召喚相關的「記憶」，並將關於廣場革命的爭議以及對於革命支持與否與戰爭聯繫起來。俄國的目的是散布焦慮、恐懼與憤怒。俄國指稱「廣場革命是民族主義者發起的」、「他們的作為只是符合美國與西方的利益」、「亞努科維奇是被西方推翻的，新政府不具備正當性」等，並將廣場革命的支持者與「大烏克蘭主義者、納粹、法西斯者」概念掛勾。¹³這些指控，加上實際上在廣場革命期間許多抗議場合可見到烏克蘭極右派團體全烏克蘭聯盟「自由」(Svoboda) 以及有烏克蘭民族主義之父之稱的斯捷潘·班德拉 (Stepan Bandera) 的巨幅頭像，更是直接或間接地強化了俄羅斯的宣傳力道(見圖 4)。俄國訴諸斯拉夫兄弟之情，將二戰時期蘇聯解放納粹占領區的概念置換成現實時空俄羅斯出

¹³ *Ibid.*

手對克里米亞與烏東地區提供人道救援，企圖引起當地的迴響。¹⁴

圖 4、RT 播放的廣場革命抗議景象



資料來源：RT

由於俄羅斯為 1994 年簽署《布達佩斯備忘錄》的締約一方，而該約保證「烏克蘭的領土完整」，若然正式出兵，無疑有違反國際法的問題。因而，透過「協助」與「公投」等名義，俄羅斯達到干涉目的而又能規避違約責任的質疑。俄羅斯不斷宣稱自己是出於人道援助，並且是「尊重在地聲音」。這種說法持續延續到它在《明斯克協議》與《新明斯克協議》的立場。¹⁵

肆、結論

烏克蘭在地緣政治上位處歐盟/北約—俄羅斯交界，烏俄關係在諸多面向與台灣面臨的國內外挑戰有可類比之處。有鑑於此，2014 年的烏克蘭危機對思考我國面臨來自中國的挑戰有諸多啟示。特別是，俄羅斯透過情緒操弄支援其兼併克里米亞半島以及促發烏克蘭東部地

¹⁴ Leonid Ragozin, “Annexation of Crimea: A Masterclass in Political Manipulation,” *Aljazeera*, March 16, 2019, <https://www.aljazeera.com/indepth/opinion/annexation-crimea-masterclass-political-manipulation-190315174459207.html>.

¹⁵ Vladimir Socor, “‘Respect’: Russia’s De Facto Recognition of Secession in Ukraine’s East,” *EURASIA DAILY*, November 12, 2014, <https://jamestown.org/program/respect-russias-de-facto-recognition-of-secession-in-ukraines-east/>.

區衝突的行動，其手法所能產生的不對稱效用，值得我國關注。

從時序言，俄羅斯的動員呈現出階段性，由抨擊基輔／西方而升高到否定政權正當性。此外，俄羅斯的攻勢針對不同群體，並著眼於「改變」與「強化」思維。其透過激化社會上人們的政治態度分歧、激化人民對政府的不滿、強化對未來局勢的不確定感、對民主體制運作的不信任感等，並同時籠絡、引導人們產生「俄國與當地社會立場一致」的想像。這與中共對我國實行的資訊戰、認知戰、統戰有不少可比較處。兩岸在語言文字基本能互通，更須嚴防中共運用地緣與社會歧見從事宣傳滲透。烏克蘭案例對台灣的重要啟示應為，我國在推動國家發展的政經歷程中須不斷重視民主教育與社會溝通，同時嚴正審視須假訊息造就的負面影響，以防中共趁我國發生重大社會危機時發動攻勢。

本文作者吳宗翰為倫敦大學國王學院中國研究院博士，現為財團法人國防安全研究院網路作戰與資訊安全研究所博士後研究。

The Politics of Emotions and Asymmetric Warfare: the Case of the Ukraine Crisis

Tsung-Han Wu

Postdoctoral Fellow

Abstract

The scale of Ukraine and Russia's land, national power, resources, and military forces is asymmetric. Without launching large scale military action, the latter was able to expand its territory and contain the government in Kiev and NATO within two months by combining conventional and non-conventional means, creating asymmetric warfare in terms of tactics and results of battle. Related literature has mentioned the contribution of cognitive warfare and information warfare to the above, however, discussion of how related mechanisms bring an effect into play is lacking. This paper introduces analysis of emotion, perception and cognizance in psychology to fill in related blanks. By analyzing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political situation from the time of the Ukrainian Maidan Revolution from the end of 2013 to 2014, this paper points out that Russia's use of communications channels to stir up anti-Kiev sentiment amongst the people in the southeast of Ukraine was effective and was key to gaining important advantages in the action against Ukraine in a short space of time. This paper is split into four parts; the first part explains the main points; then there is discussion of the connection between emotion, perception and cognizance and where an effort can be made vis a vis asymmetric warfare. The third part analyzes the situation in the Crimea and eastern Ukraine and Russia's actions locally following the Maidan Revolution. The conclusion describes the lessons that Taiwan can learn from the case of Ukraine.